

11.11

遂昌文史資料

第一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遂昌县委员会文史组

1985年4月

前 言

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是爱国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促进祖国大团结、大统一，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并惠及子孙后代的重要工作。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是做好文史资料工作的方向。遂昌人民勤劳勇敢，在近、现代史上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有许多珍贵的史料亟待我们去发掘整理。通过组织各界人士撰写亲见、亲闻、亲历的史料，可以进一步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热忱，调动人们建设“四化”的积极性。撰写文史资料必须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忠于史实，不掺假，不溢美，不牵强附会，做到正确可靠。

县政协文史组于一九八四年十月召开了“文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着手征集我县自戊戌变法至“文革”前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科技、民族、华侨、宗教、社会等方面的文史资料。现在《遂昌文史资料》第一辑出版了。

本辑史料从征集、整理到出版得到许多同志，特别是老前辈的支持、帮助，谨此致谢。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同志关心、支持我们的工作，共同把《遂昌文史资料》办好。

本辑史料的出版，因人手有限，时间匆促，未曾全面调查核实，难免有所出入。希知情者发现后及时指出，以便更正。

由于我们编辑水平有限，纰漏之处，请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一、来稿时限和范围：自戊戌变法后至“文革”前我县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侨务、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文史资料。

二、来稿文字务求翔实、确切，忠于史实，秉笔直书，以亲阅、亲见、亲历的材料为主。篇幅不限，体裁不拘。

三、对某些史料的侧面或点滴见闻，只要有借鉴价值的均可据实撰写，如有实物照片，欢迎附寄。

四、本刊对来稿可以选录或删改，不同意的可在稿末注明。来稿一经刊用，按史料价值即寄稿酬。

五、来稿请用16开有格稿纸誊写，字迹要求端正，并尽量使用规范的简化字书写，以便排印。

遂昌文史资料

(第一辑)

目 录

辛亥革命志士 创办新学先驱

——记先父李元唐先生事略……………李叔平 (1)

国共两次合作在遂昌亲历记……………程一戎 (8)

《遂昌县志》版本考……………徐元章 邱 岳 (20)

辛亥革命后至1949年遂昌历任县长简介……………黄炳文 (23)

李士群之谜……………王念勤 (30)

遂昌城隍庙祀民族英雄史可法的因果及其影响

……………王馨一 (38)

遂昌县立简易师范学校简史……………傅 赞 (44)

“林晋泰”的兴衰……………童佩璁 (48)

解放前的乌溪江木材商业……………程 幸 (55)

匪首王中道落网简记……………王竹园 (72)

辛亥革命志士 创办新学先驱

——记先父李元唐先生事略

李叔平

先父李元唐（1876—1934），字棣臣，号萼楼，前清廪生。先祖父名景萃，字秀岩，前清秀才。在县城西隅叶春年家租房居住，家境清寒。

先父自幼聪敏好学，年十七入泮，二十一补廪。青年时代起即关怀国事，接受民主革命思想；东渡日本，投身辛亥革命。嗣后，为创办新学，致力教育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为国家、为地方人民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戊戌变法和留学日本

清朝末年，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鼓吹向西方学习，以改良主义挽救中国，请求清朝政府维新变法。光绪皇帝锐意维新，接受康、梁的变法主张，发动自上而下的变法运动。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6月11日开始颁布各种变法诏令。主要内容有废除八股文、设立学堂，提倡商办工业等。但是变法运动却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的坚决反对，于同年9月21日发动政变，百日维新即告失败。

戊戌变法虽以失败告终，但它在全国各地所激起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它促起了全国人民的觉醒，导致了有识之士从中汲取教训，进一步寻求和比较各种救国的方法和道路。同时清朝统治集团迫于国内外形势的压力，也不得不作出某些姿态与让步，企图挽救和巩固已经风雨飘摇的清王朝的统治秩序。比如选派留学生，以及在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废止科举制度，设立学堂等。另一方面，全国各地的有识之士，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忧国忧民，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纷纷寻找机会出国考察、留学，谋求救国之方。在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等人的推动和影响下，接受了民主革命的主张，认识到只有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国，才是正确的道路，从而纷纷投身到这一伟大的革命行列中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遂昌虽是山城，同样也受到了戊戌变法的影响。和全国各地一样，有志之士逐步觉醒，走上救国救民的道路。行动之一就是表现在出现一股留学日本的高潮。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父亲考取了公费留日学生，于1903年毅然离别家乡，大江歌罢，东渡重洋，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后转政法大学攻读政法，研究治国安民之策。

父亲留日期间，祖父因病逝世。异国他邦，关山万里，不克奔丧。为了安慰堂上老祖母，父亲曾寄回照片一帧，题诗一首云：

仗剑长征出海关， 北堂几度倚闾看。
而今撮得庐山影， 万里孩儿咫尺间。

今日读此诗，还可想见我父当年为国不能顾家的心情。

结识孙中山先生，投身革命行列

父亲留日期间，结识了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等人，参加了兴中会和同盟会，投身到推翻清朝帝制的革命队伍。

1907年父亲留日毕业回国后，即在家乡遂昌和处州（今丽水）各县进行革命活动，同时担任同盟会驻遂昌代表，负责会员登记和联系工作，奔走于省城、宁波、丽水等地，直至辛亥革命成功。

辛亥革命前后，我父与孙中山先生时有信件来往。1929年（民国十八年）孙中山先生遗体迁柩南京中山陵举行奉安典礼，各县都要举办纪念会，国民党遂昌县党部也曾举行奉安纪念会。会上曾展出了孙中山先生给我父亲的一封信。

辛亥革命后，1912年宋教仁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但成份庞杂，政权被袁世凯等北洋军阀所篡夺。1913年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以老同盟会员为骨干，另组中华革命党。根据我父遗下保存多年的中华革命党人的长卷名册以及在上海开会拍摄的代表巨幅合影照片，可以推断，遂昌县以老同盟会员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曾经与沿海各省革命党人联合响应并参加孙中山领导的1915—1916年讨袁护国运动和1917年反段护法运动。

辛亥革命后直到解放，我家一直保存着父亲生前留下的大批革命文物资料，如笔札、信件、文稿、日文书籍，和全省同盟会革命党人的长卷名册、巨幅合影照片等，可惜均毁于十年动乱之中。

当年遂昌人同时赴日本留学的还有程景曾（字省三、三仁乡项村人）、王璆（1878—1913年）又名小才（三仁乡判川人），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佯狂故里，变卖田产，秘密出走，不知所终。蓝田（三仁乡高碧街人）、项堂（字芥舟妙高镇人）等人。

创办新学，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

我父是一个辛亥革命志士，又是遂昌创办新学的先驱者之一，为遂昌新学的创始奠基和发展，耗费了毕生心血，为国家培育了不少英才，可谓桃李满园。

一、早年留日以前的1901年—1902年间，父亲租住西隅叶春年家，就开办新学教授学生。当时学生有陈笃卿、留诚信、童训和、汪奎、徐立勋、陈志荣、徐火炎等十余人。年龄在十二、三岁间，陈笃卿年最幼，现已90余岁，仍健在。（按：于1984年12月因病去世）

二、创办妙高山两等学堂。留日归国后，父亲是当地首先剪辫子的革命党人。清政府迫于国内外形势和民众压力，废除了科举制度，在各地设立学堂。在我父和地方开明士绅的努力和倡导下，创办了妙高山两等学堂并亲自任教，1909年任校长。当时在校任教的有项堂、吴朝勉、王昌杰、尹尚元、留印雪等；学生有王锦枫、王秉一、郑锡桂、郑锡芝、傅瑞清、周盛新、周葆良等。该校为我县废科举办学堂的先河，也是当时全县最高学府。按现代教学设置课程，学生肄业期满后发给毕业证书，学生还有统一的校服，包括配戴学生帽，军体训练，甚为雄壮。

1910年（宣统二年）黄中法“造反”抄学堂，两等学堂因此停办。办新学之举遭受挫折。

三、自办实验学堂。为了创办新学，推动国民革命，在妙高山两等学堂被抄，面临阻力和挫折的情况下，我父亲于1911年在城南后坑路培玉堂内创办新学，（1909年迁家于此），当时学生有叶奉、李焯、李锡庭兄弟等七八人。该实验性学堂，革除了旧的教学方法，汲取外国先进经验，创立新的教学方法，设置了唱歌、图画、体操等课程。当时社会上守旧思想还很严重，不少人抵制甚至反对新学，不愿自己的子女读学堂书。我父为此奔走宣传，不遗余力，终于冲破重重阻力，不但办好了这期实验学校，而且还为以后创办学校打下了有利的基础。1911—1912年父亲等人在同善堂创办了黎照初级小学，学生叶奉等转入该校读书，校长华鹤峰，教员有王卫卿等人。辛亥革命成功后，将课文中“我爱大清国”改为“我爱共和国，我爱五色旗。”

四、创办师范养成所。1912年（民国元年）在城隍庙创办了遂昌县第一期师范养成所，以后改为师范讲习所。目的是为了在全县设立学校，办新学，开新课，废除八股文，设置新课程，改革旧的教学方法和制度。因此必须首先准备师资条件。故学员中有前清秀才来参加学习。

师范讲习所为期一年，约有学员四十余人，当时除去我父亲外，任教的有项庭、叶萼辉等人，学员有王兰、王迪、王锦枫、王恺、赵寅、尹仲衡、周马珠等人。

嗣后，1912年起在县城报愿寺（俗称大寺）设立了高等小学（即现城关区小学前身），并在全县各地相继成立了初级小学。县城有道南（南街）、昌山（东街）、屏山（西

街)、竞先(北街)四所小学。至此,我县新学教育已初具规模,为此后的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师范讲习所第二期、第三期分别办于1921和年1929年。同时,父亲在民国初年起即受任县政府学务委员,负责视察、督导全县各级学校的教学工作。

五、国学进修班。我父于1923年参与国学进修班的教学,同时任教的有王锦文、李观仁等,学生有陈可珍、徐景华等。

先父早年奔波革命,创办新学,并一直担任学务委员之职,为我县的教育事业革旧创新、繁荣发展而鞠躬尽瘁,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终至积劳成疾。1933年病重时,县长陈瓚时常前来探视,并说他正在筹划编修县志,说“正要借重李先生的道德文章,共襄此举。”迫切盼望他能早日恢复健康。然而,父亲一生清廉自持,晚年贫病交加,终于一病不起,于1934年2月与世长辞。

父亲学贯古今,兼通中西文学、政法和医学,工诗善画,尤以画兰闻名遐迩,兼擅书法金石,其字颜筋柳骨,造诣很深。遂昌水亭上的匾额“留淳亭”和联对“石上流泉,清斯濯纓,浊斯濯足;林中天籁,鸟以鸣春,虫以鸣秋。”即其手书。当时遂昌知县程荫谷、龙泉书画家璞轩等均曾得到我父的墨迹,并回赠精雕帽筒、重彩画幅,至为珍贵。

父亲去世已经五十年了,至今仍受人怀念称颂,说他是我县近代史上一位革命家、教育家和书画家。

我根据母亲生前的教诲和过去接触到父亲遗下的资料,以及近年来较广泛地走访了健在的父辈老先生们和父亲的学生多人,承蒙他们缅怀往事,细说当年的所见所闻,较为具

体地证实了我父生前事迹。从多方面印证了本文所述材料。

今天欣逢我县政协征集自戊戌以来的文史资料，因提供我县在清末民初时期辛亥革命活动和我父创办新学的部分资料。际此盛世，修志治史，实属壮举，缅怀先辈，展望未来，愿我们为“四化”事业和建设新的遂昌而共同努力吧！

一九八四年十月三十日

国共两次合作在遂昌亲历记

程 一 戎

1924年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从而取得了北伐的辉煌胜利。1937年国共再度合作，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枪口对外，迫使日本帝国主义者终于无条件投降，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历史的事实，使全国人民认识到：“合作就是胜利，分裂招来祸患”的真理。因此现在全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在内，都一致渴望再来一次第三次国共合作，促使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我生而逢时，得能在第一、第二两次合作中亲身参加遂昌县的党务工作；回忆往事，感触至深，爰不揣浅陋，将两次合作在遂昌亲身经历的始末情况，据实书写出来，以告后人。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1926年我还只有十七岁，暑假前在丽水的省第十一中学毕业后，到上海考入大同大学普通科（即预科）肄业。寒假回家，因沪杭路发生孙传芳同卢永祥的战争，交通受阻，假期满后不能返校，只好停学在家。恰在这时，遂昌县第一个共产党员唐公宪（本县塘岭头人）以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候补执委兼省党务人员养成所所长的身份到遂昌来指导筹建遂昌县党部。经过短时间的协商和联系，宣布遂昌县党部正式成

立。但因党员人数不足规定的标准，最初只称“中国国民党遂昌县第一届区党部”。过了不久，扩大吸收了一批人入党，足够了法定人数，才由省党部批准改称县党部。第一届县党部的组织人事如下：常务委员程醉春（高桥人）、秘书周春先（应村人）、组织部长谢云集（王川人）、宣传部长吴光斋（湖山人）、农工部长傅以和（塘岭头人）、监察委员王佩剑（判川人）；干事有程先民（三仁项村人）涂澄（湖山人）、周志平（里高人）、章铸（妙高人）、杨介白（妙高人）、谢芬（王川人）、方振凤（女、云峰乡人）、童素娥（女、妙高人）王瑾如（女、妙高人）、华光庭（妙高人）、郑斌（上定乡人）、程一戎等。

1927年一月县党部成立后，大家的工作热情都很高，经常下乡召集工人、农民、学生和各阶层群众开会、宣传“打倒列强，内除国贼”和孙中山先生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每到一乡一村就教大家学唱“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每一句都重复唱的简单易学的歌曲，很短时间就使这支歌传遍了大大小小的乡村，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三月间还在城隍庙（后改称史公祠，是当时遂昌最大的群众集会场所）的戏台上演出了《袁世凯的皇帝梦》的文明戏。所谓“文明戏”是与昆曲、乱弹、的笃班等不同的一种演剧形式，有锣鼓等乐器，但没有唱词，不穿古代服装，也不画花脸谱；完全用自编的说白来表演，有点近似后来流行的“小话剧”和“活报剧”的形式。那次的文明戏，由程醉春扮演袁世凯，表情滑稽，说白清楚，淋漓尽致地把袁世凯想当皇帝的丑态表现出来，引起了台下观众的哄堂大笑。每举行一次宣传活动，群众都欢喜赶

来参加。但是好景不长，忽然一个晴天霹雳，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唐公宪在事变的当天就在杭州同浙江省委宣中华等同时被捕。这样，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即告破裂。不久国民党中央宣布实行全面清党。五月份，浙江省党部派松阳人孟卿为遂昌清党委员，常驻遂昌负责清党和改组县党部的工作。找了几个所谓忠实分子对县党部的所有人员进行逐个摸底，一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谢云巢是在衢州八中读书时由李士群介绍加入共产党的，在筹建遂昌县党部的过程中，他发展了吴光斋（化名吴佩兰）、傅以和二人加入了共产党。这时，他们三人心里清楚，只好采取昼伏夜出的方法把自己暂时隐蔽起来，根本不同孟卿见面。程醉春、周春先等人自以为不是共产党员，可以安全过关，所以还是继续办公，维持残局。但是清党委员方面却认为不抓几个人是交不了账的，首当其冲的程醉春第一个被捕，送到设在兰溪的军事法庭审问后关押了七八个月。第二个逮捕的是周春先，由于杨介白向清党委员会检举揭发，说他曾写过一张“从白色恐怖下求解放”的标语，证明他是共产党。结果，周春先也被抓到兰溪关押了八个月。第三个逮捕的是吴佩兰，因为吴光斋参加共产党时用的化名恰好和他相同，后来查清了才被释放。当时，我们一批人则宣布要重新登记，不去登记的一律清除出党。我没有登记，因我年纪最小，孟卿也始终没有找我谈过话。隔了几天，我就同谢云巢、吴光斋、傅以和三人结伴同行，出北门、过插花岭，从小路徒步去龙游，然后搭交通船顺流而下，转赴上海。吴光斋（现住杭州，1985年2月去世）和我同进大同大学读书；谢云巢、傅以和二人则

去投奔名义上在上海大学读书、实际上从事上海地下党工作的李士群。在我们遂昌，第一次国共合作就这样结束了。国民党破坏合作所造成的恶果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在遂昌则激起了以傅以和为首的塘岭头农民暴动。

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

1931年“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我东北三省，蒋介石死抱不抵抗主义，任其长驱直入，到了濒临亡国的地步，全国军民无不义愤填膺，一致要求抗日救国。后来经过西安事变，终于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停止内战。迨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件爆发，全国同仇敌忾，情绪高涨。“八·一三”事变后，国共重开谈判，再度合作团结抗日。消息传来，全民欢腾。当时我正在省教育厅工作，热血沸腾，不甘蛰伏，坚决辞去教育厅职务，转入东南日报社，要求派赴华北前线担任战地记者。后因报社工作需要，留我担任一版战讯编辑，并兼任省抗敌后援会宣传工作，每天撰写方块短文，鼓吹抗日救国。杭州沦陷前，我又被派出陪同中央党部宣传视导团到浙东各县宣传抗日救国。任务完成后，杭州已陷敌手，我的全部财物均未带出，只身一人到金华找教育厅长许绍棣。这时，国民党中央为了收拾失去的民心，决意大力整顿各县的党务工作，派谷正纲来浙江担任省党部主任委员，省党部又将全体执委派赴各行政区担任办事处主任，直接处理区属各县党部的整顿工作。许绍棣恰好派到丽水担任处州区办事处主任，于是邀我同行，作为办事处的办事员。到了丽水后，首先陪他去处属各县视察了一周，看到各县的

党部大多暮气沉沉，毫无生气，完全不适应动员民众抗日救国的要求，非进行一次彻底改组不可。当时遂昌县党部是由刘凯、苏紘、周彦几个人轮流担任书记长，连任十年之久，所有的党员清一色是遂昌东北乡方面的人，号称“刘苏周派”；勾结官府，操纵议会，包揽词讼，开场聚赌，无人敢撻其锋，俨然是遂昌的霸王。许绍棣通过调查了解，也不禁摇头叹息。所以在回丽水的路上，他就向我提问：“你是不是有兴趣回家乡干一番呢？”在浙江的C.C派中，许绍棣被公认是比较开明的一个人物，他当教育厅长时，我曾在他身边共事多年，他对我的个性和工作能力是比较了解的；我曾由于他的信任，主持过省会骑射会、青年夏令营，和1936年在杭州举行的第四届全国运动会的筹备主任和大会总干事，都有一定的成绩，受到过他的赞许。听了他的提问，我说：“如果你要我回去，我愿意回去。不过我不愿意说一套做一套，要真正的做到精诚团结、合作抗日，你能同意吗？”他微笑着说：“还是小心点的好。”我当时理解，他基本上是同意我的想法的。到了丽水，他和谷正纲通了一次电话，立刻派我去遂昌担任党务特派员。第二天就把派令和把原有旧人员全部解除职务的训令交给我，要我尽快回遂昌。

我先到碧湖青训团，找到在那里受训的大拓华洋人林鹤，邀他陪我步行回遂。途经松阳在车路边一处墙壁上写有“国防部特务工作团松阳分团”字样的大庙里找到了在那里当分团长的唐公宪。十年不见，分外亲热，坚留我在他那里过夜，以便促膝长谈。这才使我得知他就在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后，由他的党务人员养成所的学生李楚狂（金华人，当时是浙江省党部监察委员）把他从反省院里保释出来

的。我也坦率地告诉他我这次回遂昌的使命，希望他能协助我，做我的军师，辞去现职，回遂昌任县党部秘书，善始善终地为家乡服务，完成第一次合作时未完成的事业。他听后略一考虑，欣然表示同意。要我先走一步，他马上办理辞职移交手续，三天后赶到遂昌会面。

我于1938年一月到遂昌县党部接事，旧人员中除了留用程先民、童任侠和录事朱启明等几个人外，其余全部解职回家。这自然引起了“刘苏周派”的极大反感，从此对我采取了敌对的态度。及至唐公宪如约赶来担任了县党部秘书后，更使他们切齿痛恨。隔了不久，因1928年在塘岭头领导农民暴动失败，被政府通缉，逃亡在外十年不归的傅以和也闻讯赶到，要求安排工作。我和县长陆希澄（兼抗日自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我是副主委）商量之后，决定派傅以和担任县抗委会的总务干事，这尤其使他们大吃一惊。刘凯本来是浙江省党部调查统计室（即中统）驻遂昌的通讯员，于是他们就三天一个小报告，五天一个大密告，向省调统室揭发控告我如何任用共产党员担任重要工作，以及我如何同县政府的红色分子密切合作的情况等等。省调统室的主任是方青儒，也是C.C派中人，但在党里的地位要比许绍棣低得多。我是许绍棣直接委派的，而且事先我已向他透露过我的意愿，我坚信许绍棣决计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和我翻脸。同时，方青儒如果没有得到许绍棣的同意，对我也是无可奈何的。因此我始终抱了“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的态度，置之不理。但是他们不肯就此罢休，竟向省里告密说：“遂昌不仅是县政府赤化，连县党部也赤化了，正在准备成立苏维埃政权。”这种完全捏造的谣言，稍有知识的人当然是不会相信的。但也使